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友通讯

目 录

序言·····	沈仁道	(1)
---------	-----	-----

文 章

师生重相聚 共话燕园情·····	刘元胜	(9)
难忘入学后第一堂课·····	李恩波	(13)
回眸往事心无憾 ——记职业生涯中的几件事·····	刘家林	(18)
铭记老师教诲 当好国门卫士·····	谢玉和	(30)
北大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张学斌	(33)
四年大学学习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根基·····	任全礼	(39)
负重潜行不辱使命 ——风雨后的顽强拼搏·····	尹光平	(45)
为北大争光 为名校添彩·····	李丙德	(52)
师恩难忘 情重如山 ——感怀恩师赵宝煦·····	李桂霞	(55)
情系母校·····	刘淑萍	(59)

千里接病人 冰雪映真情

——记民建会员、大连海事局高级工程师张泽显 …… (68)

今天我的工作年龄寿终正寝 …… 桑国生 (71)

诗 词

师生情谊铸心间 …… 任大奎 (77)

师情话谊

——参加国关学院七零级学员返校座谈会有感

…………… 李如海 (78)

安平乐慢·盼同学相聚 …… 张学斌 (79)

沁园春·老雁一群 …… 张学斌 (80)

永遇乐·相拥喜忆 …… 刘家林 (81)

和琴心剑胆 …… 刘家林 (82)

致“未名湖畔” …… 石立新 (84)

卜算子·只把情挽住 …… 郭兴柱 (85)

干杯！我的兄弟姐妹

——写在同学相聚的时刻 …… 刘元胜 (86)

为“五·二八”同学聚会即席而作 …… 琴心剑胆 (88)

与同窗夜宿大连湾 …… 王愿军 (89)

燕园情深 …… 张景豹 (90)

燕园随想 …… 滕利贵 (91)

序 言

沈仁道

《未名湖畔同学情》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前身)1970级同学为纪念入学46周年、毕业42周年而集体创作的诗文集。今年5月28日,70级同学在国关学院举行了毕业以来的第一次全班大型聚会,国关学院及院友会领导和当年为70级授课的老师,包括当时在北大国政系任教,文革后又转回人民大学国政系的老师,身体较好的几乎全部应邀出席,同窗、师生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其情其景,令人感动!为了更充分地表达同学们的北大情、师生情、同学情,更好地反映同学们毕业后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以及所创造的业绩,会议的组织者刘家林、李桂霞、张学斌等同学号召大家赋诗撰文,题材自选,体裁不拘,长短不限,最后汇集成册,便形成了这本诗文集。这充分说明,尽管大多同学们之间以及同学们与北大之间阔别近半个世纪了,可谓“沧桑巨变,乾坤翻转”,然而同窗友谊,北大情结是难以忘怀、割舍不断的,而且日久弥坚。

40多年前,70级同学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进

入北大的。此时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建国后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教育领域内哪些要肯定?哪些要扬弃?哪些要废止?在那极“左”思潮笼罩的年月,人们处于失序之中。然而,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岂能长久停摆不前?于是,北大等高等学校,在停止5年招收新生之后,于1970年招收了首批工农兵大学生,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指示,在实践中摸索、探求新的办学道路。70级学生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岁月进入北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教学和同学们的学业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干扰和影响,这是大势所在,谁也无法摆脱这种历史环境的局限性。

但是,70级同学是经过全国各地各基层单位推荐、选拔而来的,尽管他们入学时文化基础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是优秀的。就国政系当时的学生状况而言,他们中很多人在基层有过一定的实践经验,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比较强,为国家为人民而学习的目的比较明确,因而他们入学后能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刻苦攻读。在校的四年学习生活中,虽然下乡下厂开门办学的时间多了些,但他们仍然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接受了基本理论、传统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和训练。国政系的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比较深入地学习了中共党史和毛泽东同志的党建学说,初步学到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这些基本理论、历史和知识为他们日后走向

社会、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学习和施展才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集”中不少同学在谈到当年理论学习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时,都给予了高度的、深情的肯定。李丙德同学说,在北大的学习“为我奠定了扎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尹光平同学说,在北大的学习“让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终生受益匪浅”;任全礼同学说“四年的大学学习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根基”。如此等等,应该都是符合实际的肺腑之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同学们在北大的几年中,除了在着重学习基础理论、文化知识和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培养和提高之外,北大精神、北大传统和北大校风对同学们的熏陶和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看似无形,实为有形,不是课堂却胜似课堂。何为北大精神、北大传统和北大校风?北大的先贤先哲,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有过许多不同表述。比如,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校训,我理解应该是北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人把北大的特点概括为“独立精神”、“有特别见解”、“做事有坚强之毅力”、“服从真理”、“气量宽容”等等,我想这些也都体现了北大精神的重要内涵。大凡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渗透和感染,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形成北大师生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不竭源泉。北大国关学院教授、70级同学张学斌在文章中说:“北大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这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70级同学毕业后,无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种职业,处于何种地位,大家都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恪尽职守,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和社会奉献了聪明才智,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他们中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管,有许多党政机关的干部包括县团级以及司局级领导干部等等,其中不少同学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例如,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务员司原司长刘家林同学,工作中不拘传统,以开拓创新精神,和同事们一道,在公务员录用、选拔等方面创造了新的改革方法,从而推进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又如军队某院校教授李恩波同学曾主编出版专著 10 多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曾先后获得几十项各种奖励和荣誉,赢得单位和社会的莫大尊重。实践证明,70 级同学没有辜负父母的养育,没有辜负老师的教导,没有辜负北大的声名! 他们和北大文革前、文革后的广大毕业生一样,同样为北大赢得了骄傲和光荣!

感谢 70 级同学邀我为“文集”写序言,我欣然接受。上世纪 70 年代初,同学们到北大时青春年少,风华正茂,而我也只三十岁出头,刚留校不久,虽才疏学浅,但热情不缺。我能与他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走出北大开门办学,到过工厂农村,一同“拉练”,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交流学习经典著作等课程的心得体会。70 级是个大班,全班 120 人,我同他们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对他们很有感情。1974 年他们毕业后,天南海北,各奔东西,联系少了,但每每念及。如今聚会,虽相隔 40 多年,不少同学已霜染华发,体型也多有变化,但一见面,我依然能叫出他们多数人的姓名,脑海中能立即反应出一些同学的主要特点,同学们也能回忆起当年的桩桩件件,彼此交谈甚欢。他们正式聚会的时间是 5.28 日上午,我因事不能出席,故在 27 日下午提前到宾馆看望他们,同去的还有任大奎老师,与大家一起留影,晚餐。令我意外和措手不及的是,留

影时,主持人李桂霞同学突然宣布:“明天是沈老师的生日,我们祝他生日快乐!”她话音一落,“生日快乐”之歌响彻整个大厅,同时有女同学向我敬献鲜花……这一幕令我十分感动!当教师的,能得到学生们的如此敬重,是莫大的欣慰。但欣慰之余又觉得十分的歉疚和不安,想当年他们在校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学业上我所能给予他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与北大教师应有的水准更相距甚远!如果时光能倒流,我还选择做一名教师!

从1970年到2016年,岁月悠悠,转眼46年过去了。同学们也从青春勃发到如今的白发幡然,相继步入了老年,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晚霞照样可以绚丽多姿,特别是赶上了好时代,国家日渐富强,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十分令人鼓舞!我衷心祝愿大家在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之际,也能力所能及,继续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正能量,继续保持和发扬北大人的光荣传统!

上述,写在前面的话,算是与70级同学的一次书面交流吧!

2016.11.26



文 章

师生重相聚 共话燕园情

刘元胜

五月的北京大学风光旖旎，未名湖波光粼粼，博雅塔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国际政治系（现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1970 级同学重返母校，给燕园增添了新的异彩。

1970 年，我们 120 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满怀着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求来到北京大学。四年的学校生涯，我们在老师的辛勤培育下，在追求人生真谛的漫漫长路上艰难地跋涉，度过了最难忘的青葱岁月，结下了珍贵的师生之情和同学之谊。1974 年那个最寒冷的冬日，我们依依惜别，含泪相约再聚燕园。正如同学们所说的那样，“北大是我们的理想之梦开始的地方”，“我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友情”，“这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

告别母校，我们牢记老师们的嘱托，北大的精神是我们不竭的力量，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无愧于曾是北大人！

这迟来的相聚我们等了整整四十二个春来秋往，如今已是双鬓染霜，渴望着重聚的那一天。

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从北国的疆城到南国的花都，从塞外的莽原到东海之滨，带着对母校的眷恋，带着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带着同学们的深厚情谊，风尘仆仆地来了。

5月27日，参加聚会的同学陆续来到驻地。锡华宾馆门前，电子屏上“热烈欢迎北京大学70级同学”的红字引人注目。陈淑敏、阚延河、李桂霞、刘淑萍、李丙德同学早早来到宾馆大厅迎接大家。大连同学最早来到，大家久别重逢，心中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握手、拥抱、问候。分别将近半个世纪，多少言语也难以倾诉心中的挂牵。

三年前，在北大东门直隶会馆的一次小型师生聚会上，刘家林等同学提出70级同学聚会的设想。去年，在刘家林等同学的努力下，建起了70级“末名湖畔”的微信群，把远在千里之外的同学紧紧相连。同学们在群里深情回忆在燕园的美好时光，倾诉蕴藏在心底的相念之情，期盼重逢的时刻。

今年三月，部分北京同学聚会时，群主在李桂霞、阚延河等同学的倡议下，决定召集70级同学在五月二十八日重回母校。倡议很快得到入群同学的热烈响应，纷纷通过微信或赋诗来表达心中的宿愿。

为了能参加聚会，同学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张泽显同学患眼疾，正在治疗，知道返校的消息，执意参加，并制作了纪念横幅，请大家签名，永远珍藏。张秀萍同学为了能参加聚会推迟了出国与家人团聚。同时，为了寻找失联的同学，刘淑萍，王军，张景豹等同学不辞辛劳，想尽了一切办法，克服了无法想像的困难。石立新、孟宪明、王世盛等同学毕业后长期失去联系，当他们被找到后，当即决定参加聚会。截止到目前，仅有十几个同学尚无消息，上微信群的已有65个同学。

27日上午，参加聚会的同学陆续到驻地报到，有的同学身体欠佳，在家人的陪伴下赶来了，有的夫妇同行，有的带着儿孙。截止到下午六时，59位参加聚会的同学都已前来报到。因故不能参加

的同学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深厚的同学之情。

四年的学校生活,我们和老师们朝夕相处,结下了难得的师生之情。当我们向老师们发出邀请时,老师们不顾年老体弱,欣然应允。特别是任大奎老师、沈仁道老师知悉同学 27 日来京,特地在当天下午赶到同学驻地问候大家,这浓浓的师生情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每批同学的到来,都在酒店大堂引起一阵欢呼,紧紧的拥抱,激动的泪水让旁观者无不动容!

晚上,师生共进晚餐,喜逢沈仁道老师的生日,女同学向老师敬献鲜花,祝老师生日快乐,一起唱响《生日之歌》。席间,两位老师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学们互相交流,畅叙友情,仿佛回到当年在学生食堂用餐时的情景,一片欢歌笑语。

5 月 28 日,是我们 70 级同学难以忘怀的一天。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和学院院友会老师非常重视同学们的这次返校,给了很大的支持,提供了各种方便。刘家林、阚延河、李桂霞、赵大文、张学斌等同学为筹备返校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午,国际关系学院门口悬挂的“热烈欢迎国际关系学院 70 级同学返校”的横幅格外醒目,整个学院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在约定九时半照集体像之前一个小时,参加聚会的老师和同学就早早来到国际关系学院大楼前。当年给 70 级授课的老师一一被同学们辨认出来,他们是:梁守德、黄宗良、任大奎、石永义、郭树岐、曹长盛、李如海、朱美宜、宁骚、江长仁、金顺姬、孟继友、陈峰君等。他们虽已耄耋之年,但风采依旧。他们与 60 多位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同学回忆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往事,将大家带入到那个特殊的年代,融融的情谊仿佛又回到了 40 多年前。

会议开始前,同学们满怀深情向老师们献上了鲜花,共同合影,表达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寒梅代表学院首先向返校的 70 级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她向大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状况,大家为学院取得的成绩由衷地高兴,也被学院对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在学院发展历史上的评价所感动。

黄宗良教授做为教师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回忆了当年师生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动人情景后,又为大家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黄老师的讲话感人肺腑,令人难忘。

学生代表刘家林讲话,表达了 70 级同学对学院和老师的感谢以及对每位来聚会和不能参加聚会同学的良好祝愿。会议室内春意融融,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欣慰的笑声。

会议结束后,师生共进午餐。

下午,同学们高兴地在一起座谈,李如海老师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活动。大家纷纷回忆起在校学习的往事,讲述毕业后的经历,畅谈同学间的珍贵情谊,令人激动的场景不时出现。大家有讲不完的话,表不完的情,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纷纷表示回去后利用微信等平台加强交流。

晚上,在大家用餐之前,又出现了一幕动人情景。八十多岁的王炳元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餐厅看望同学,同学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29 日上午同学们在久别的校园中漫步。在大讲堂前,俄文楼边,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办公楼西面的松树林和西校门高兴地留影,深情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的同学拿出了珍藏了几十年前的老照片,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转瞬间,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不舍。他们纷纷表示,重返母校的相聚太有意义了,会永远珍藏在心中。

相聚是短暂的,友谊天长地久。让我们约定,重聚在又一个春天。

难忘入学后第一堂课

李恩波

我们70级的大学学习生活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但同样也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人生财富。对我来说,四十六年前入学后第一堂课上的一段出乎意料的小插曲,给我的大学学习生活,乃至一生的工作和事业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几十年里一直难以忘怀。

1970年10月初,我们参加国庆节天安门广场游行和晚会活动后(这好像是20世纪50、60年代北大学子的“常规”活动),开始正式上课。

第一门课的名称我已经无从考证,只记得学习内容包括毛泽东的一篇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著作。具体的教学安排是,先由老师介绍学习计划,布置思考题;然后学生自学,按照思考题准备讨论发言提纲;接着召开几十人规模的班级讨论会,汇报交流学习成果;最后老师讲课,对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和提高。

和其他同学一样,我认真学习有关资料,写出了讨论发言提纲。只是,我没有局限于按照思考题作问答题式的阐述,而是把“重庆谈判”的背景、目的、内容和历史意义等,总结归纳成几个具

有辩证法特点的对偶性范畴。我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不太符合老师的要求,有点“另搞一套”的“嫌疑”。但是,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实在不忍割爱,只好以“学习心得”、“讨论发言”等托词来自我宽慰。

班级讨论会如期举行,同学们依次发言,主讲老师全程旁听,我也为没有受到质疑而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然而,随即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小插曲。主讲老师找到我说,你学习很认真,讨论会上的发言很好,准备让你到全系大课上再讲一次,还说原来安排的老师讲课环节也取消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有些诚惶诚恐,我能行吗?尽管有着种种的不自信,但毕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老师让讲那就讲吧。

当我从讲台走向座位时,发现赵宝煦老师恰巧坐在我后面的座位上,正在翻看 I 放在座位上的学习笔记。赵老师见到 I 只是笑着点点头。

这一幕虽然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但我一直很自责,为什么当时不去主动征求一下老师的指教呢?自己真是少不更事啊!这件事也许不过是老师调动同学学习积极性的一个小举措,或者是活跃教学气氛的一个小“花絮”。尽管表面上 I 从来没有再和老师、同学们谈及此事,但它实际上已经在我的思想上荡起阵阵涟漪。除了难免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得意”之外,更多的是增强了我对大学学习的信心。我的学习成果既然得到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老师的肯定,那我也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更重要的是, I 似乎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学习上也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老师的思路走,能够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或许

更好。这些朴素的感受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但对于我刚刚开始、尚处于迷茫状态的大学学习生活来说近乎为一场恰逢其时的启蒙。

在读书、学习中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依托北大图书馆这一举世无双、得天独厚的丰富教学资源,我心无旁骛地开始了读书、自学之旅。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科学的读书方法,只是笨笨地对每个专题都从历史、原著、现实等不同角度去广泛阅读、广采博收。而且,读书也不仅仅停留在阅读和理解的层面上,常常会把自已摆进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实验性地思考我在同样的情况下又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主张,等等。同时,坚持写读书笔记,特别是把自认为有独立思考价值的学习心得用短论文的方式整理出来。大学毕业时,我得到了几本厚厚的读书笔记,由于有些内容的独立思考味道很浓,所以一直密不示人。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连续几年的自学和读书,对于我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练自学、练思考、练研究、练写作的过程,不经意间奠定了能力素质方面的最初基础。

尽管我们的大学学习生活处在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但北大终究是北大。在学习过程中,我有幸耳濡目染了老师们的各种教学和研究方法甚至是“技巧”,比如在跟随老师编写马列原著学习辅导材料时,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写书”工作;看到老师用胶水和剪刀对书稿进行剪剪贴贴的修改(这是当今电脑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我既好奇又“脑洞大开”;发现有的老师上台讲课居然手里只有一本书甚至几张卡片,更让我崇敬有加、叹为观止……更为幸运的是,与我们的专业本来并无关系的一些科学大

家、学术大师们,如周培源、周一良等,也曾经站在我们的讲台上侃侃而谈。

那时,我对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和工作去向虽然根本无从掌控,但是在北大校园里天天耳闻目睹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知不觉间也在头脑里琢磨起怎样讲课、怎样做学问了。以至于在听课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观摩者的角度去比较、分析老师们的不同方法和风格。有时甚至还会悄悄地“狂妄”一把,在笔记本上偷偷地记下自己眼中某堂课的“得”与“失”,以及应该如何去“改进”和“完善”,等等。在工作实践中升华提高。

1974 年毕业后,我先后在机关和基层任职,无论什么工作都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但是,每当我在书报上看到有关北大的一些文字时,间或也会莫名地泛起一丝“已经离北大越来越远”的感觉。

1978 年 12 月,我被调到某高校任教。这所学校与北大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教师工作的职业特点,还是迅速唤醒了深藏内心、尘封已久的北大所学、所得、所悟,开始在新的工作平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在长期的实践历练中不断升华和提高。

由于没有开设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我从任教的第一天起,就离开大学所学专业,“改行”从事其他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但这对于我,并没有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凭借在大学打下基础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我初出茅庐就顺利地打响了第一炮。在 30 多年的教学生涯里,我讲授的课程由哲学扩展至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哲学等方面,其中不乏填补空白的全国首

开课程,均获得良好效果。曾被院校教学主管部门专家组评价为几十所受检院校中讲课最好的两位教员之一。独创的“一例到底教学法”(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相关论文发表在教育部工作指导性刊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期刊上。2010年和2012年,我应约在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推出系列讲座。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实现不同门类知识的融会贯通和能力方法上的触类旁通,使我能够借助学科“杂交”的优势深入开展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我先后主编、出版十几部专著及教材,发表100多篇论文,完成多个课题项目,其中有些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入学时懵懵懂懂的小青年成长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几十项各种奖励和荣誉。抚今追昔,我衷心地感谢北大,感谢让我深受启迪、受益终生的入学后第一堂课。

回眸往事心无憾

——记职业生涯中的几件事

刘家林

在人生的职业生涯中，有巅峰有低谷，有坦途有险滩，有快乐有烦恼。这才是生活，这才是人生。如何处理职场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职业生涯中的种种困难，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方向，认真履行职责，既需要讲究工作艺术，又需要心中有格局、有胆识、有魄力，心里装着做人的良知、装着人民的利益、装着党的伟大事业。这样才能做到宁静致远，忘却功名利禄，感受工作之美好，感受成就之欣慰。

下面就说说职业生涯的几件事。

几件趣事

一九七四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办公地在后海北沿，曾是醇亲王府，里边有四进院，古香古色。主任是一位和善可亲可敬的老革命，曾是抗战时李先念部队的卫生部长。另两位副主任：一位是林佳楣女士，另一位是于旺，由国家计委文教司调来的。刚毕业大学生到机

关工作,首先是抄抄写写及干一些杂事,后来,我工作的重点是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当时与中国人民大学乌先生及人口研究所刘真沟通较多,他们是当时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

在那段日子里,我拜读了马寅初老先生人口理论等著作,了解了前苏联人口的相关政策,受益非浅。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决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符合当时的国情,现在看也是对的。如适时提前调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可能会更好些。除研究相关政策外也常随委领导下乡调研。印象最深一次是佳楣副主任带我们出差,去一个县医院检查他们做人工流产的技术状况。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对异性没有任何了解,想到这方面的事就心跳加速脸发红,更别说进手术室了。而主任要求我必须到进手术室了解有关情况。我换好衣服浑身颤抖着进入手术室,脑袋一片空白,看到手术流血,马上就晕倒了,被女医生和护士抬到外面,一个多小时才醒过来。那位漂亮的女医生说,你们中央机关的干部就这个胆儿啊,真纯洁。女护士也以奇怪的眼神看我,仿佛我是外星人,简直无地自容。不过,自此我才知道自己有晕血症,以后领导再也不让我进手术室。

随佳楣副主任出差,除调研了解计划生育外,她还安排我用一定时间了解地县两级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这种调研是未经地方领导安排,随机性较强,直面地、市、县领导,有些是基层老乡,这样我们得到的都是基层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写成报告后交佳楣主任,即完成任务。后来我才知道,实际是为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提供基层的有关情况。

还有一件事永远铭记,七六年初刚结婚(三十一岁实属晚婚),不久,领导让写一篇上到周恩来总理下到协和医院妇幼专家

林巧稚的批判文章,当时我要求去协和医院了解情况后再写,经领导同意做了调研,事实与要求批判内容相差甚大。我不愿昧着良心写这样的批判文章,只有跟领导说我水平有限写不出来。不久,我即被派往甘肃酒泉医疗队“锻炼”,粉碎四人帮后才回到北京。我提出调动工作,主任多次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主任只好同意。

我的新单位是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领导安排我在政研室工作。该机构是伴随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运而生的,当时谷牧任主任,李瀚任研究室主任。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是给领导起草报告,参与研究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规划、开发和建设等工作。其中一项任务是研究如何利用外资和如何用好外资。关于利用外资问题,我与刘向东等同志合写了《我国利用外资概况》、《利用外资知识手册》等著作和文章,应该说对我国当时利用外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主要任务是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本区域经济。后来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与外经部、外贸部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我仍在该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被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一九八三年底调到劳动人事部,此间参与了工资和劳动制度改革。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会后,随着经济体制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政策的不断落实,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原有劳动制度存在“管的过死,包的过多,能进不能出,一次分配定终身”等弊端,矛盾尤为突出,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经济,必须对劳动制度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思路是,首先进行就业制度改革,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单一渠道招工改为全民、集体、个体、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多种渠道就业,实施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合同期满后双方自愿续签或解除合同。同时彻底废除内部员工

顶替和内招制度,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还有些有趣的事不说了,我一生职业生涯变动了八次工作,恰是二十年前美国人才流速。日本劳动力一生流动二十次左右,主要是政府或企业内部流动。我的这些工作变动,其中两次是主动要求调动,余下是被动调整。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特别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期间,我对宏观经济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侧重研究了外贸、外汇、金融等问题,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在宏观决策方面收获颇丰。

人才市场与人才流动

八十年代中期我出任人事部流动调配司司长、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主任。当时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我国物资、技术、金融等要素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才市场的发展较为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市场与之相适应,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所需人才,否则有碍市场体制的完善,最终将影响经济的发展。人事制度深化改革,也急需为人才市场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业已开始的机构改革和实施公务员制度,也将面临机关人员分流问题,急需发展人才市场,使人才能够流动起来。总之,经济体制的改革急需人才市场的发展,以前的计划经济调配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只有发展人才市场方可合理运用人才宝库,满足多种经济成份对人才迫切的需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人才市场的理念,但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对如何发展人才市场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关于人才市

场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均有较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均为商品,人才进入市场进行交流具有商品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才做为商品进入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我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才不能做为商品进入市场。理论之争一时难以有结论,而实际工作中人才为部门所有,到处都是人才壁垒。有些单位尤其是中央单位人才过剩,造成人才闲置和浪费,而有些单位特别是省市有些部门和学校人才急缺,甚至正常科研工作都难以展开。实际工作部门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放开人才限制,允许人才流动,必将导致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动到发达地区、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从基层流动到上级单位,这样会使人才分布不均衡的状况进一步恶化。面对这样的大前提,必须审慎处理人才市场和人才流动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有利于经济发展,对人事制度改革会其到促进作用。反之,将会带来不利影响。当时有些同志和朋友建议,这种事还是等等吧,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为好,不要为此冒风险。

此时,我带领我的团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和讨论以上问题,特别是从经济学和市场经济角度研究和探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和解决人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属性,创造性地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鲜明的观点和充分的论据,提出建立人才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若干市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我们还认识到,在实际工作中,如果通过人才市场将人和岗位进行合理配置,可改变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状况,形成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择员、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用人机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符合政治体制改革的

要求。对那些理论之争暂时不去讨论,有鉴于此,我们向部领导请示报告,建议召开人才与技术交流大会,特别是加上“技术”两字可避免很多麻烦,减轻工作阻力。

部长办公会正式批复召开全国首届人才与技术交流大会。大会于1993年10月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李沛瑶,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等领导出席大会开幕式。全国四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国务院68个部、委、局,组团率四千多家企事业单位汇集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摆下942个人才招聘摊位。三天活动有近十万人入场,展览中心同志说这是建馆以来最为火爆的一次活动,可谓盛况空前,硕果累累。海南省在这次大会上达成人才流动意向6000多人,其中有硕士学位的2000多人,有博士学位的300多人,有高级职称的917人,有中级职称的2300多人,战果辉煌。

有北方香港之称的大连市,在大会第三天上午,与1500多人达成意向,初步流动成功601人,其中给155名应届毕业生发接收函,给29名干部发了调令。湖南省在大会第二天有2000多人达成意向,湖北省有4000多人达成意向,西藏达成各种人才技术交流协定200多项,新疆达成500多项。

这次大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广大求职者、招聘单位和社会舆论界的一致好评。有的媒体称,这次大会是中国人才流动史上的里程碑。这次大会共有近十万人参加洽谈,达成流动意向3万余人,初步招聘成功的1.2万人,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全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的需求。为配合这次人才交流活动,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特事特办的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扫清了人才流动的障碍,打破了人才部门所有的现状,为

营造“才尽其用”的环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为人才在更大范围内合理流动和科技成果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交流大会对促进全国人才市场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全社会对人才市场的认识,淡化了理论之争,大踏步地推进了人才市场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有利于人才成长,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是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申论》的由来及作用

1994年我由流动调配司交流到考试录用司任司长,是新部长上任后第一位或者说是唯一被交流的司长。

当时的考录司在人们眼中是没有多少事可干。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事也意味着有很多事可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干还是不干,是无所事事还是开拓进取。当时恰好是《考试录用暂行规定》刚颁布不久,要求党政机关用人制度进行改革,改变学生分配派遣的传统模式为通过考试录用选拔人才的模式,通过新的选拔机制为党政机关合理配置人才。改变多年来通行的传统选人办法并非易事。当时机关补充人员,主要是应届毕业生按其分配计划,指令性分配到各用人单位,极少由事业单位或社会中调入到机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单位掌握其选择权,各用人单位掌握的标准不一样,随意性较大,有关系的可找人们认为较好的权力单位,没有关系的很难进入机关工作。所以,一到毕业季,毕业生均想选好的单位,动用各种关系各种办法,条子满天飞,用人单位为摆平各种关系,煞费苦心,择优用人,谈何容易!这种选人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我任流动调配司司长期间,主管用人单位计划指标,饱尝其苦,深感安排人员之压力。

实施考试录用办法,通过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办法选人。这实际是用人权的再分配,削弱了用人部门的权力,统一了选拔标准,提高了选拔质量,使被选者有了基本公平的权利。这种改革冲击了传统用人制度,必然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而且许多应届毕业生也会感到不适应。当时我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或者说是严峻的考验。

改革考试的方式使其有科学性,是这项改革的难点和焦点。上世纪90年代初,少数政府机关缺编,尝试通过考试办法补员。当时主要考试的科目,一是《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包括语言理解表达、常识判断、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五部分,二是《综合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及相关知识的大综合。三是类似高考作文的写作。

实施考试难的问题,可通过推行制度解决,可考试科目和内容不是制度所能解决的。对已有的科目与考试内容进行改革,自古以来都是风险极大的事情,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我们加大了对考试科目内容科学性、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研究,每次考试后我们都组织命题老师、专家学者、用人部门和参试学生,对科目的设置及考试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论证,对各个试题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对科目进行详细的心理测量学分析(效度和信度)。通过广泛征求意见,问题归纳起来为四类:一是考试科目设计不合理;二是考试内容缺少差异化和针对性;三是作文题测试内容不科学,反映较为尖锐;四是考试内容与机关实际需要相差甚大,难以测出考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此我们内部展开多次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改革考试科目和内容风险较大,一时之错,将影响考试录用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不仅会影响整个人事制度的改革,还可能引起考生的不满,甚至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不仅是考试录用司内部的忧虑,甚至部领导也有此担心,这些不无道理。对此我认真思考过。从业务层讲,我们认为,经过三年多的调查研究论证,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之间关系,尽量避免引起社会震动,从总体上看,对科目的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应该说找准了力度,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是无大的影响。从个人层面说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无所作为,按以往的思维前进,不去尝试改革,对我个人和单位来说没有风险,这也是职场上常有的事。二是有所作为,为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承担起责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少考虑个人得失,多考虑事业发展的需要,敢为天下先,这可能是我做人的特质吧。

借中央国家机关 2000 年考试录用的东风,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提出了“分类考试、突出能力、方便考生、定时定期”16 字方针。经周密安排,决定对考试内容进行大幅度改革。一是取消综合知识考试内容,将其部分内容放到《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中。二是设立《公共基础知识》,全部为客观性选题(该科目于 2002 年取消);实际上这是过渡科目。同时根据各部门不同情况允许设立《专业考试》。三是取消作文,设立《申论》科目。该科目测试构架是由当时我司考试录用处夏文峰、林园、陈祎、常晓勇以及北京市两位语文特级教师顾德希、薛川东等同志共同研究创立的,他们是《申论》科目的创始人,其中两位来自教学一线的老师对“申论”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可以说,《申论》科目的推出,是我国公务员考试史上的一大创举。

什么是《申论》?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申论》不是一种文体,是根据公务员工作的需要专门用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一种笔

试方式。简言之就是申而论之。“申”是申述、申辩、申明的意思；“论”是议论、论说、论证。《申论》是对某个问题阐述观点论述理由，合理推断观点与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准确把握客观事实，做出必要的说明论述，提出方略进行论证。申论把阅读和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文章写作与实际应用脱离的弊端，从而避开了传统作文中那些不适合考察公务员的因素，使必须考察的能力得到了突出。

《申论》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测试内涵的改变。《申论》测试的是应试者适应机关工作的能力，完全体现了公务员考试“以用为考”的性质，也充分吸纳了“策论”、基础写作、公文写作和材料分析的优点。要求考生依据命题者提供的一大堆鲜活的社会生活素材进行分析、概括、提炼加工；藉此全面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测查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与机关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工作特质基本匹配。

《申论》测查内容具有普遍性。与其学生所学专业关系不大，不会产生对某些专业或某类人的倾斜，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应试者也是充分体现了公平。由于考生来自不同专业，所学内容不尽相同，所以在申论考试中，给考生材料大都具有普遍性、非专业性，取材对大家一视同仁，让所有考生都有思考，都有话说。比如2000年第一年实施申论考试，试题内容是围绕红星新村居民状告印刷总公司一事展开。初看材料以为学法律专业考生会占便宜，其实不然，此事不是单从法律专业角度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从社会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再如2001年考题是关于PPA风波事，是当时社会热点之一。看似是医药卫生问题，而问题的设问和解答均与医药卫生专业知识水平

高低没有关系,其测查的是考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申论》测查形式灵活多变,可根据不同内容设计不同的测查方式。申论考试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测查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 2003 年的《申论》试题,根据安全事件突发特点,假设考生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或某个地方的负责人,就突发事件发表电视讲话,写一篇讲话稿。这种测试方式与现实工作结合的非常紧密。2004 年我们对《申论》试题又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单一主题扩展到两个主题,即我国汽车发展现状与交通拥堵问题,借此考查考生能否清晰区分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问题,而不混淆和混为一谈。随着无纸化问卷的深化,2005 年的试题,我们又尝试了主观试题答案客观化,在申论考试中设计了选择题、判断题和释义题,起到了很好的测试效果。

《申论》诞生至今有 16 个年头,没有被改变,也没有被超越,不仅成为公务员考试的基本方式,还被党政机关副处以上领导职务竞争上岗、事业单位、企业等用人单位广泛应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目前,《申论》考试已经被用人单位和应试考生普遍接受,再也没有人问起申论是什么了。《申论》最大的特点是公平、科学和适用,试题的测试内容与实际工作需要完全匹配,录用人员到岗后很快适应工作,这就是与以往考试最大的差异,也是几千年中国考试史上的一大创举。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随着《申论》的改革,其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以期达到更好的信度和效度。由于某些原因删掉“倾向”二字,严格意义上说维持原名更为科学。《申论》测显能,《能力》测的是潜能,二者测试角度不同但又有内在的关联,以达到选拔出优秀人才、使人才和岗位合理匹配的最佳效果。

考试科目和内容是考试录用制的核心内涵。除此之外,当年还研究了全国统一考试、四级连考、分类考试、系统垂直考试、面试、考官资格、题库建设、人才测评等。完善考试录用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顶梁柱,是人事制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有幸在任公务员管理司司长期间在全国党政机关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对以往的人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本人经历这次改革的全过程并贡献了微薄之力,这也是人生之幸。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才市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逐步趋于成熟,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公务员考试设立了《申论》科目,犹如一棵青松历霜傲雪,耸立在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实践证明,我们当时的改革决断是正确的。回想起来,应该衷心地感谢母校,感谢老师对我的培养,使我在北大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坚定了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这是我一生用之不竭的财富和力量源泉。

铭记老师教诲 当好国门卫士

谢玉和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学习和生活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系统的基础理论学习,为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坚持理想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师们高尚的师德,渊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严谨的学风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毕业前夕,高作民老师叮嘱我要继续读书,好好工作,老实做人的临别赠言,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惜别母校后,我重返上海海关,直到 2006 年退休。我始终铭记老师的教诲,加强学习,勤勉工作,严守纪律。在组织的培养下,经过实际锻炼和考验,我逐渐从一线关员成长为正厅级海关领导干部,被授予一级关务监督关衔,被评为《海关法》学科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工作中,我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履行职责,当好一名国门卫士。

上世纪 90 年代,一股走私狂潮在我国沿海、沿边地区泛滥。走私祸国殃民,它偷逃国家税收,冲击民族工业,扰乱市场秩序,腐蚀干部群众,破坏社会稳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公安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等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走私的指示,积极行动,有力打击了走私犯罪活动。

上海虽然不是走私重灾区,但走私行为时有发生。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三不”方针,即:上海决不靠走私发展经济,上海决不能成为走私通道,上海打击走私决不手软,对走私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市政府成立了打击走私协调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孟建柱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打私办),该办设在上海海关。

1990年8月,我任上海海关调查处(前身为查私处)处长,兼市打私办主任,负责具体开展上海关区的查缉走私和打私办的日常工作。我们上海海关严守国门,全方位加强实际监管,加大查缉力度,查获了一批走私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配)件的大案。当时,我们根据海关总署的通报显示,香烟国内外差价大,暴利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香烟成为走私热点商品。为了有效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先后走访了市经委、外经贸委、商委、工商局、税务局、烟草专卖局等单位,了解上海地区香烟生产、销售、进口、税收及市场管理情况。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上海口岸的运输工具种类、进口货物结构和地域特点加以分析,得出不法分子除可能利用国际航行大型船舶走私香烟,也有可能利用沿海运输的小型船只,通过吴淞口水域,上溯长江黄金水道,或直驶黄浦江走私香烟的判断。

为此,我们决定开展查缉走私香烟的专项行动,制定了具体措施:一、加强情报工作;二、加强与公安机关和工商、烟草专卖、海事、港务等单位的联系配合;三、利用关艇对黄浦江水面进行巡查;四、派员到停泊在吴淞口的国轮上对该水域进行监控;五、联系驻沪海军登五支队,请求在符合条例规定的情况下出动小型舰艇支援。

几天之后,在吴淞口负责瞭望的吴淞海关一位科长报告,发现一艘行迹可疑的船只。按照预案,我马上安排调查处一位副处长

带队直奔吴淞军港,经部队首长批准,登上一艘快艇,会同海军官兵急驶该可疑船只。靠上该船后,经询问船长,此船是空船去江阴港装载黄沙、石子运往广东。但是经开舱检查,发现货舱里装着整箱整箱的香烟。于是将该船押至上海港高阳路码头继续调查,查实该船装载南洋红双喜、三五牌香烟共计 500 箱,价值人民币 120 万元。因无合法进口证明或批件,也没有报关纳税,构成了逃避海关监管,运输国家限制和应税进口商品,偷逃税款的走私行为。由于该案案值超过了法定起刑点,遂按照法律规定将船长移送公安机关。由于其他船员没有走私前科和该船是专营走私工具的证据,故对这些船员及船只予以放行。对查获的走私香烟,按规定由烟草专卖局作价收购,所得价款由海关全额上交国库。

该案是上海关区查获的首起走私香烟大案,也是军政联合缉私的成果,有力打击了走私的嚣张气焰和震慑了走私分子。海关是国家的大门,我作为一个国门卫士既感到无比的自豪,也深感身上所肩负的重任。我以曾是一个北大学生倍感骄傲,永远当好守卫国门的忠诚卫士!

2016 年 6 月 21 日于上海

北大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张学斌

1974年初,我留校分配到学校政工组宣传组工作。由于厌倦文革时期假大空的宣传,我几次要求到教学岗位工作。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又向国政系总支书记赵国栋老师提出回系当教师的要求,得到了他大力支持。赵国栋老师和学校宣传组负责人张侠老师都住在朗润园,还是近邻,赵老师一连两天中午端着饭碗到张老师家院子聊天,以系里教学需要为理由请张老师放我回系。张老师最终同意了。

我回到国政系国际共运教研室工作后,得到了张汉清、黄宗良、曹长盛、吴金泉、颜复明等老师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他们手把手教我备课和搞研究,向我传授如何当好教师的经验,甚至无私地把讲稿和参考材料借给我使用,使我很快站上了讲台,初步适应了教师岗位。不久,我被推选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共运教研室支部是一个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非常认真、相互间很团结的集体。支部经常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举办小型研讨会,结合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况谈党的建设;举办党史学习讨论会,结合参观李大钊烈士纪念馆讨论继承先烈遗志;每个人准备一个菜,在家或野外聚餐畅谈教研室建设;定期召开生活会,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共运支部的建设得到了学校党委的重视,整理了材料报送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组织部对共运支部的建设进行了考察。1986年7月,共运支部被北京市委评为先进党支部。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表彰大会,共运支部和北京其他单位九个支部被授予北京市“先进党支部”的称号,我光荣地代表共运党支部上台领奖。此后,我们又被送到中南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共运支部获奖后,我的论文也被推荐给一个官方举办的全国性的研讨会。在会议筹备中,有关人员把我找了去,建议我修改一下论文。我的论文是谈执政党建设的,其中提到苏联共产党腐败变质的原因不应局限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等二战后苏联领导人身上寻找,应从斯大林时期党的高度集权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寻找,斯大林五十年前播下的种子,现在结出了恶果。找我谈话的人指出,斯大林有错误,但评价要适度,建议我删去有关段落。我没有同意,当即表示撤回自己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我知道,这样做对我的发展会有影响,但我是个学者,我要求真求实,这也是北大精神所在。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我论文的观点,对我的作法不感到后悔。

我知道,在北京大学做一名称职教师很不容易。他不但要求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科研能力以及教学技能,更要求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好的师德,要以身作则教育和启发学生,要有甘做人梯的牺牲精神。我在上学时学得的东西离教师应有的知识要求相差非常远,要想胜任教师岗位,必须做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多年很少有假日,几乎每个周末和寒暑假都用来学习和工作。我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两点左右,只是在感到有心被掏空的感觉时,才上床睡觉。十平米的房间既是一家三口的卧室又

是我的书房,中间不到两平米的空间在冬天还要放煤炉。有一天,我太疲劳了,没有盖好炉盖就睡着了,一家三口都中了煤气。我庆幸第二天没有我的课。在北大教书 32 年,除了我父亲去世,我没有耽误过一次课,没有迟到过一次。每次上课,我都要至少提前十分钟到教室,与学生进行交流。我要求自己备课必须充分,每堂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直到上课之前;讲课必须严谨,要和学生多互动,要对得起每个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最喜欢向我提出挑战的学生,当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时,我会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下次我会给你一个回答,我会表扬他们问倒了老师。课后,我会抓紧时间看材料,研究问题,下次上课时给他们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每当学生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甚至鼓掌时,我常常在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学生不也是我的老师吗?这不正是北大精神吗?

我的教学获得了学生肯定,在全校性的学生评教调查中,我始终在前百分之十,有一次还进到前百分之三,两次获得北大教学优秀奖。

教学活动不单在教室,也包括社会实践和考察。我曾经几次承担了带领学生考察任务。记得 1985 年 9 月至 10 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交给北大国政系一项考察任务,我带领其中一个组共 20 个学生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考察。从北京出发要坐三天四夜火车和四天汽车才能到目的地,一路上,我和学生们互相关心,加深了友谊。刚到自治州首府芒市,我就被路边的青苔滑倒了,脚肿得走不了路,学生们对我非常关心,郑永年(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同学甚至背着我到州委开会。我非常感动,决心作好学生的榜样。住宿时,我把好蚊帐分给学生,把破蚊帐留给自己;调查时,我认真组织学生反复讨论调查提

纲,拄着竹棍带领学生下田入户;为了深入调查景颇族的生产和生活,我和同学们穿越过原始森林,身上留下了旱蚂蝗叮咬的血痕。我的行为感动了学生,他们要求我在住处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和学生一样辛苦。我告诉他们,我上学时,系里的老师就是这样做的,我要向老师们学习。这次社会实践,我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调查成果得到了自治州领导的表扬和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肯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政系开始办一些学习研讨班。最早的研讨班是国际形势研讨班,各大学相关教师参加。为了组织好这类活动,系里临时安排几个人做会务工作,我被领导选中了。

此后,国政系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以培训教学为主的开发活动,成立了开发办公室,我被委任为开发办主任。当时我提出的条件是不能离开讲台,要开两门课。我知道,我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每年的开发活动,至少占用我四个月时间。我要备课、讲课、搞科研、写书,还要提高英语水平,时间真是不够用。更使我感到巨大压力的是系内的竞争。我在花费大量时间为集体创收,而同事们却在搞科研和社会学术活动,搞不好我就会被从教学岗位上淘汰下来。是潘国华老师教育了我,他当时任系副主任,我配合他工作。我看到他为了做好系里的工作,放弃了大量休息时间。有一次,在完成了繁重的工作后骑车回家的路上,他竟然睡着了,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了几本专著。我决定以他为榜样,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把开发和学术工作都要做好。

科研成果是比教学更令人重视的工作,它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晋升提职,能否保住教学岗位。我写的第一部专著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审二审都通过

了,在最后关头被一个红头文件判了死刑。当时苏东发生了剧变,文件规定所有研究苏东的著作,除内部出版外不许公开出版。我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被忽视了。好在国关学院同意作为内部教材印刷。我把教材送给中央党校同事们看,他们都为这本著作的遭遇感到惋惜。

我后来将研究领域放在经济外交上,首先我努力争取开设经济外交课,我写了开课论证,搞了调查研究,又去英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重点收集经济外交方面的材料,终于在国内首先成功开设了经济外交课。在开课基础上,我又成功写作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经济外交专著《经济外交与国际经济秩序》。不久,北大出版社又出版了我写的《经济外交》教材。当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对此教材发表评论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教材建设上也正力求有所进展和突破,他们在近年来颇为时兴和流行的经济外交教材化建设方面已有比较出色的成果。”此外,国内一些院校相关专业也选用了这本书做教材。在退休前几年,我在学院几个年轻教师的鼓励下,力图建立北京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遗憾的是,由于我即将退休,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清华大学后来成立了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并牵头召开了经济外交研讨会,我对他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2006年1月在北大退休,2月底就来到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与这所学校有合作关系,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我们的院友,为了支持学院的发展,他出资装修学院的秋林报告厅。学院还在2003年派我考察了这所学校。2004年,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人邀请我退休后到他那里帮助办学,我答应了。开始我在这个学校任教务处长,当年4月,我在全院教师大会上作的期中教学检查报告得到了大家好评。大家说,这就

是北大水平。我立刻感到我虽然退休来到广州工作,人们还是把我看成是北大人,我应该把北大作风、北大精神带到这个学校来。此后,我从抓课程建设开始,加强了教学管理,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不久,我相继出任教学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的职务。我在学校虽然是第一把手,但我拒绝住进院领导的套房,与大多数教师一样,住在约十平米的单间。我每天第一个到办公楼工作,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楼。所有的发言讲话都是自己起草,从不盛气凌人。有的教师奇怪地问,北大的教授威望很高,为什么你这样和蔼,从不见你发脾气?我常常告诉他们,北京大学有许多名师、大家,在北大校园散步时,你不经意间看到的普通老头、老太太,他们不少就是中国学术界的带头人,是世界知名学者,他们非常谦虚和蔼,体现着北大精神。我是个普通教书匠,那些学者是我的榜样,要牢记北大精神,不能给北大抹黑。后来,沈仁道老师、潘国华老师、李寒梅老师、王其芬老师都访问过这所学校,当他们肯定我的工作,我都要感谢北大的老师对我的培养,感谢北大精神对我的影响。现在,学院已经升为本科院校,名字也改为广州工商学院。我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继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北大精神我会永远不忘。

四年大学学习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根基

任全礼

2016年5月28日,分别四十年后,我们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七零级同学,举办了全年级大聚会。畅谈同学友情,回顾人生经历,又一次使我深感四年大学生活的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根基。

我们学习时,国际政治系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重要专业之一,这必然要涉及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众多马列主义名著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等。特别到入学中期,按照周总理指示,学校越来越重视专业学习,我们也先后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我当时感觉这些理论很新奇、深奥、神圣,因此学起来很刻苦,当时学过的很多马列主义原著我至今还保存着,上边划满了黑线红道儿,写满了眉批。这使我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入了门,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记得当时每进行一段理论学习后,系里就组织我们到工厂、农村,向群众讲解学过的理论,还经常安排我们到校内举办的一些社会性学习班上讲课。张汉清等老师作我们的指导老师,总是精心指导我们撰写讲稿,耐心教我们授课技巧,我们自己也努力探讨如何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特别到临毕业前,学校举办校内工人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我系派我和陈淑敏去做辅导员,另外还有其他系几个同学。我们平时总是一字一句地与工人师傅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经常抽出时间去工人单位或家中走访,了解他们的学习难点,探访他们的求知热点,学习他们的特色语言,以便讲起课来他们爱听。这样,我们的每次授课都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说“我们听得懂,爱听!”学习班结束后,学校在大操场举办全校大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请工人师傅谈学习体会。记的当时管理体育器材的赵师傅,校制药厂的王师傅,在学习体会发言稿中都大篇写有表彰我们学员的话,当时主办学习班的校方领导,为精练发言要求他们把这些内容删掉,但赵师傅硬是留下了一句话,他在大会发言中首先喊出了这句话——“我们学员讲课就是好!”获得台下一片掌声。

上述这些经历,使我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我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门头沟区委宣传组(后改部)工作。当时分理论组、宣传组、办公室。由于领导不知我的根底,所以开始时没有明确我的工作岗位,每天让我打杂,还经常被派往乡下“学大寨”,偶尔让我写篇小总结之类的文章,还时常因为不慎用错了个标点符号而受到斥责,当时心情确实很苦闷。

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一天,区妇联举办全区妇女干部理论学习班,开课时间已到,授课人却因故不能到场了。妇联领导心急如焚,赶快到区委宣传组求助,希望派人代讲一课,说讲什么理论都行。由于事发突然,事前没有准备,所以同事们谁也不敢应承。俗话说“救场如救火”,看到妇联领导急成那个样子,我实在不忍心了,就大着胆子说:“我去讲吧”,组领导听一愣,说:“你刚来,行吗?”我说:“行,我有上学时的现成讲稿,保证大家爱听!”领导还不放心,就尾随我坐到台下去偷听。当他看到我在

台上讲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台下人听得津津有味、欢声笑语，不时响起掌声后，才又猫腰退出去。

这件事情以后，我被明确分工到理论组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进步。1984年我被提任为主管理论教育的副部长，以后又提升为常务副部长，并兼任区委党校书记、区精神文明办主任、区委理论讲师团团长，几乎分管了全区所有理论宣传、教育、研究工作。这期间，虽然有多次变动工作的机会，但历届领导似乎达成了共识，都说：“谁都可以离开宣传部，任全礼不能，全区理论工作离不开他。”所以我一生36年工龄，都是在宣传部这一个岗位上度过的，这在全市宣传干部中都不多见。

在职期间，我自觉弘扬北大精神，追求卓越，兢兢业业，创新工作，先后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北京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首都精神文明奖章获得者等。

我在母校学习基础上，继续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利用四年时间通过了党政干部自学高考的各项课程，获得了又一个国家承认的高等学历，还取得高级政工师职称。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了自己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曾在《北京日报》、《红旗》杂志、《宣传手册》等市以上报刊发表过十余篇理论文章。改革开放不久，我撰写的调研报告《农民怕变的思想表现及根源》，被市农工委以内部文件形式转发全市农村，并在全国农村一个相关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我撰写的《浅论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入理解邓小平的富民思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等论文，在市委宣传部等七单位举办的理论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其中，《深入理解邓小平的富民思想》，还被《北京日报》内参、市委政研室《调研报告》转发。

我作为一名基层理论工作者，在北大学习钻研的基础上，不断

自觉探讨马列主义大众化问题,使理论宣讲也得到全区认可,被首都师范大学聘为“首都新农村社会与文化建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在高手如云,竞争激烈的北京理论教育最高奖—《灵山杯》优秀党课、理论辅导报告奖中,也曾多次获奖。家乡人民给我一个名过其实的美称—“门头沟的赵树理”、“门头沟的理论家”。

我在职时活跃在全区理论讲台上,退休后这几年依然如此。

回顾这些经历,是四年的大学生活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根基,我永远要感恩母校的。毕业后虽然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但以实际行动胜任了自己的工作,担当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担当的责任,这是我略感自慰的。

(附)一件没有向党组织如实汇报的事

我 1969 年入党,至今已有 47 年党龄了。我经常向我女儿夸耀说:“你老爹我也是老布尔什维克了”。但她哪里知道,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曾有一件没有如实向党组织汇报的事。那是我们入学的第三年,系里安排我们到顺义县一个农村去下乡,(村名记不清了)除了听课学习以外,还经常下地劳动。一天,我们和村民一起参加挖树坑劳动。到达现场后,村里的领工干部在应挖树坑的地方,隔一定距离就用白灰撒一个圈,一个白圈就是一个树坑,并讲明了树坑的深度宽度要求。随后他就按人分配圆圈,说谁先挖完谁就可以先收工回家。可能是我们学生应该得到照顾吧,我记得分配给我的只有四、五个白圈。顺义那个地方土很厚,也很软,树坑又在耕地之间的隔离带中,所以没用多长时间,大家就陆续挖完回家了。当我挖完最后一铁锹土,也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却发现一位老者仍在那里卖力地劳作。我想:“我们是北大学生,应该为发展集体经济多做贡献,应该关心帮助贫下中农呀。”于是,就向

那位老者走去。

老者是位男性,大约六十来岁,穿一身黑衣服,很清瘦,脸上布满了皱纹。我看他挖的那个树坑早已符合标准了,但仍然使劲往下挖,就奇怪地问道:“老大爷,您这树坑已挖好了呀,干啥还再挖?”我喊他“老大爷”时,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随后回答说:“这坑里有块大石头,我得把它挖出来”。我说:“只要够深就行,不用抠这石头了”。他不满地瞪我一眼,倔强地说:“这坑里埋块大石头,小树苗往下扎根就费劲,就不容易成活。咱干活可不能糊弄人,我得把它挖出来!”

我被老者的精神感动了,赶紧说:“老大爷说得对,我来和你一起挖。”老者急了:“你可不能帮忙,这点活我自己干得了,你快回家吧。”我也有点急了,说:“大爷,你这是何苦呢?现在天还早,我回去也没事,再说,这么大石头您自己怎么弄得出来呀?”老者看我态度坚决诚恳,话又在理儿,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我俩轮流开挖,不一会儿,这块大石头就完全露出了土面。然后,他用十字镐在上边拉,我用双手在里边掀,硬是把石头翻了一个身。我俩跳进坑里连推带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块又大又圆的石头请出坑外,着实出了一身汗。老者拍拍手上土,往坑边一坐,说:“任务完成了,你先走吧,我得喘口气儿。”我说:“我也休息一下,呆会儿咱俩搭伴儿走。”过了一会儿,老者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又催他和我一起走。这回老者可真急了:“我说学生,你就先走吧,我不能和你一起走!”我奇怪地向:“这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地主分子,”他无可奈何地说:“和我一起走,被人发现后不影响你的进步呀!”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这才想起,入村后我们经常看到一队人被押着游街,当时我还想:这个村阶级斗争抓得真紧,阶级敌人也真多。这不,一不小心就与我短兵相接了!我的屁股如同被蜂

蜇了一下，“噌”地一下站起来，像躲瘟神一样，赶紧走了。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那个懊悔呀！我想：我怎么管一个地主分子叫大爷呢？我怎么帮了个地主的忙呢？这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犯了立场错误呀！我得如实向党组织汇报，做深刻思想检讨。可我转念又一想：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没人告诉我他是地主分子，再说，他也不像地主分子呀。一般的地主都会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他会巴不得那棵社会主义小树栽不活，他为什么又非要栽活这棵小树呢？一般的地主分子会恨我们革命后代的，他巴不得我们倒霉呢，他又为什么再三再四地为我着想呢？我又深一步想：我回去怎么向党组织汇报呢？如果如实汇报，这不等于是美化地主分子吗？不如实汇报吧，自己犯了立场错误，如实汇报吧，又美化了地主分子，可难死我了。

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我最后还是决定：暂不向党组织汇报，等考虑好再说。想不到这一考虑就是四十年，至今我们当年的党小组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似乎悟出了点什么。这件事现在看来不算事，但对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当时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毕业以后，我为什么能深刻理解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伟大决策？为什么能真心拥护、宣传、执行党的改革开放理论？好像也从这件事吸取了一点启示和正能量。

负重潜行不辱使命

——风雨后的顽强拼搏

尹光平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我肩负人民的重托党的信任；怀着对知识的渴求，怀着梦想与憧憬；心潮澎湃地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来到北京，跨入北大，走进国际政治系，成为一名北大学生。

无论哪个时代，青年人能够“金榜题名”，尤其是上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无疑非常幸运值得自豪。我曾因此无比的激动和兴奋！

在这里，我幸得众多学识渊博、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和蔼可亲的老师的教诲和指点。

在这里，我比较系统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学到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为我的人生坐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一九七四年，我圆满完成学业。那时，整个社会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议论已是满城风雨……。于是，按照当时原则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毕业分配政策，我沿着上学时同一路线的相反

方向,回到了入学前的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一师一团三连。唯一的变化是军龄长了四年、由“炮长”(班副)晋升“车长”(班长),不折不扣回到原地,彻头彻尾从头干起。从此,天天和战友与坦克打交道,与所学专业基本无缘。

这,或许就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我的特殊使命。

我不曾被各种各样的非议困扰,也没被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击倒;我没有报怨没有消沉,从此开启了新的艰苦的人生征程:低调做人、淡薄名利与世无争,低头做事、默默奉献负重前行!九个月后,我被提升为排长,正式成为国家干部。虽然在北大所学专业知识已派不上多大用场,但我用“科学民主、务实严谨、敢于担当”的北大精神、在北大学到的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指导工作,从而在此后的各个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我所在的坦克三连,是一九六九年我入伍不久扩编时的新建连队,方方面面表现平平,因而不受上级重视。全连干部战士普遍抱怨与一、二连这两个战争年代的有功连队相比,“我们三连就是后娘养的”。

一九七九年春我接任指导员职务后,发动全连干部战士,找准我们连队自身存在的问题;明白“要让别人看得起,必须自己出成绩”的道理;看到“一张白纸”是我们的短处,但“没有负担”也是我们的优势。要求全连干部战士齐心协力创佳绩,为建连十周年献礼!同时,加强军事技术基本功训练和协同训练。这一年,全连上下士气空前高涨信心倍增,在内务卫生大检查、完成农场插秧、收稻等各项任务中均取得全团第一;尤其在作为衡量连队工作成绩

最主要标准的一年一度“战斗射击”中,我根据以往“战斗射击”不少炮长越想打出好成绩,心情越紧张,结果适得其反的教训,结合自己当炮长打“战斗射击”的切身体会作了简短“战前”动员。告诉全连炮长首先要有自信心,要相信我们自己平时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其次,上车后什么都不要想,就是高度集中精力、快速捕捉目标、准确装定诸元、迅速精确瞄准、坚决果断击发,敢于大胆修正。并承诺打好了有奖励,打得不好不批评处罚、不互相埋怨。这样,炮长们放下了思想包袱,个个轻装上阵。结果,出乎意料地取得全团唯一“满堂红”连队(全连每车均优秀)这一建连史上空前好成绩。一举改变了连队落后面貌,赢得了老大哥连队的尊重,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全连官兵士气大振!

一九八四年,我团有幸被选定为建国 35 周年国庆邓小平阅兵的受阅坦克方队。在北京通县(今通州)机场进行五个月的艰苦集训。集训期间,我们晴天一身汗和土,雨天一身水和泥,干部战士累得腰酸腿痛,走路、入厕都困难。虽然集训初期无一人叫苦叫累或思想松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每个动作无数次的循环往复演练,不少干部战士产生了厌烦情绪,引起较大思想波动。针对这种情况,我作为宣传股长,先后组织方队开展“不负天下父母心兄长情”、“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多种形式的专题思想教育。从而及时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保证了集训质量和受阅任务圆满完成。

受阅后的全团官兵无不欢欣鼓舞,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纷纷写信向家人和父老乡亲报告受阅喜讯。我们及时布置各营连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座谈总结。广大官兵自豪地畅谈了受阅的切身

感受。大家一致认为,国庆阅兵是党中央“振国威壮军威”的重大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的说,在通过天安门那一刻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高度集中精力、展现集训成果、做到万无一失、圆满完成受阅;有的说,我们能开着坦克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接受军委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检阅,是时代赋予我们坦克兵的神圣使命,是我们一生的荣耀;还有的说,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把“威武装甲之师”的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能为“振国威壮军威”贡献自己的力量感到无限幸福无尚荣光!集训期间,我撰写的《不负天下父母心兄长情》的专题经验,被阅兵“总指挥部”转发所有受阅部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经验在“总指”政工会上做了专题介绍;《组织坦克方队综合训练的作法和体会》被总部编入《经验汇编》。受阅结束,组织给我个人记三等功。我能为全团圆满完成光荣的受阅任务,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

受阅一个月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军委提出裁军一百万的任务。我服从大局,顺势而为转业到地方,继续拼搏。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到鲁迅美术学院上班。鲁美的第一大系是一九八二年组建的师范系,系里的学生多数来自辽宁农村和贫穷地区。他们入学时专业录取分数线略低于油、版、国、雕等各绘画专业。师范系教学课程设置较杂,学生什么都学但都不精,被其他系学生戏称为“吃饭系”,从而使一些学生产生了自卑感,一些受歧视的男生往往对歧视者用拳脚回敬,不时闹出一些是非来。在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为试图证明自己不那么怂包,师范系一些学生表现非常活跃、持久、固执,使得鲁美在全省高校系统有很高的知名度。

一九九一年春,院党委基于“师范系稳定则鲁美稳定”(领导原话)的考虑,我受命由染织系书记调任师范系书记。到师范系后,我决定重点鼓励学生树立自信心,我的主要做法:一是引导学生学会辩证地认识问题,辩证地去看高分低分优势劣势。懂得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高分低分只代表过去,优势劣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只要我们遵照“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不断奋发努力,就一定能创造优异成绩;二是积极支持配合系里进行专业教学改革,将学生分成侧重学油画和侧重学国画两部分,简称油画班和国画班,配备精干教师实施教学……三是对学生平时在学院卫生大检查、运动会等活动中取得的点滴成绩和进步,都及时予以宣扬和表彰,以鼓舞士气增强信心。

经过全系师生几年的共同拼搏,终于取得显著成果。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连续两届鲁美毕业生创作展中,“师范系油画班的毕业作品超过了油画系毕业作品水平,国画班毕业作品超过了国画系毕业作品水平”(时任院长宋惠民对师范系学生毕业作品的评价)。师范系终于让全院师生员工刮目相看,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全系师生自然扬眉吐气!我所取得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鼓励,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我所在的系党支部连续六年被评为院、市先进党支部,我个人被评为院、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与师范系不同,油画系则是实施艺术“精英教育”的基地、造就艺术家的摇篮,历任院长的发源地。学生入学时的专业录取分数线高于全院所有专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盲目优越感,有的入学伊始就以画家、精英自居。“油老大”的思想严重,自由散

漫、不遵规章、缺乏礼貌、趾高气扬(鲁美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油画系学生)。全院卫生大检查,就有高年级学生公开抵触说:“我们油画系还搞卫生?!”因此,油画系学生的教育管理多年来一直是一件让领导头疼的事。一九九七年,鲁美油画专业被确定为辽宁省艺术类第一个重点学科。为了配强系领导班子,油画系对新任系党支部书记人选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要女性;二是必须征得全系每一个老师同意。院党委权衡再三,在先征求我个人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我调到油画系。

要调教好油画系学生谈何容易(尤其对于不懂艺术专业的干部而言),既要能讲道理还得有魄力。当务之急是要给他们脑子里“油老大”的思想适当泼点冷水降降温。我的主要做法是抓两头促中间,管理教育相结合,以教育为主。一是搞好新生入学教育。每年新生一入学就教育引导他们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一分为二地认识别人和自己。要严于自我解剖,多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长处。要低调做人踏实干事,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二是加强对全系学生“在法律、纪律、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树立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在校规、校纪面前不允许有特殊学生的意识,做到人人自觉守法遵章;三是抓好表率作用,要求高年级和研究生做出好样子(这只需点到为止)。这样,两年后学生思想面貌和行为表现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院师生尤其是老师和机关干部一致反映,油画系学生明显变好了。

我在做个别学生思想转化工作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果。一九九九年,邪教“法轮大法”殃及全国,一名很有艺术天赋的二年级学生误入歧途迷上“法轮大法”,精神状态和学习成绩急转直下。为教

育挽救这名学生,我们多次找其谈话,讲清“法轮大法”的邪教性质,它所鼓吹“真、善、忍”的实质及其对国家、社会和信奉者个人的危害……。然而丝毫未能打动这名学生;我们又数次将其父(大连某高校中层干部)母请到鲁美,配合协助我们做工作。父母软硬兼施,几度含泪劝导儿子回心转意,这名学生仍然无动于衷。为对学生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也痴心不改、锲而不舍地坚持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月艰苦、反复、耐心的思想工作,终将这名学生从“法轮大法”的泥潭中彻底解脱出来。该生逐步恢复了以往的精神状态,表示一定要把被“法轮大法”耽误的学业补回来。此后,该生一心扑在学习上,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研究生。毕业时,院系不计前嫌,根据该生表现仍将其留校任教,至今一直表现很好。

斗转星移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个当年朝气蓬勃的年轻战士如今已年近“古稀”。回望四十年的艰辛历程:曾有过朗朗的笑声,也有过委屈的泪水;有过成功的自信,也有过挫折的警醒。我也为“报效国家”奉献了聪明才智年华青春。我,无愧北大恩师的培养,无愧北京大学的盛名,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

为北大争光 为名校添彩

李丙德

我 197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北大学子。我为今生能成为北大学子感到高兴和自豪!也为这一身份的取得深感责任重大!为北大争光,为名校添彩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北大学子的共同心愿!

我在北大的几年,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学说等重要政治思想理论,这为我走向工作岗位奠定了扎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北大毕业后,我回到军政大学(现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担负全军团以上政工干部的理论培训。1978 年,我有幸被选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到中央机关工作是我人生又一新的转折。在以后的近 40 年里,直接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从理论到实践更有了新的认识。我深切感受到,在北大学习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等,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智慧、给了我武器,让我在工作实践中如鱼得水!

李维汉同志是我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长期担任

中央统战部部长。建国后,他根据毛主席指示,带领工作组深入江苏、上海等民族工业较发达地区调查研究,用了八个月时间,向党中央提交了我国没收、改造、收买民族工商业为国有企业的报告,被中央采纳。他作为中央谈判代表,参加了达赖集团的谈判,签署了《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他长期深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我国少数民族重大理论决策建议,是我国卓越的民族宗教工作领导人和理论家。我调机关工作后不久李老逝世,我被调到《李维汉回忆录》和《李维汉文集》编辑组工作,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到陕北、西安、湖南等地搜集李维汉同志当年从事革命活动的资料和文稿,深入博物馆、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收集李老史料工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老一代革命家在为革命取得胜利,为百姓大众翻身解放,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付出的努力。从阅读编辑大量文稿、书信、日记等资料的过程中,学习领略老一代革命家崇高的道德情操、革命胆略和胸怀,他们心中装的是革命利益、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八十年代后,一批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的老同志,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们经历并参与了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具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他们是“活”档案。为了抢救党的宝贵财富,领导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编写组,我担任联络员,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和协调工作。安排编辑组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召开党内、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大纲书稿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1996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上下卷),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统战篇),永藏于国内各大档案馆、博物馆和资料馆。这是目前国内最权威、最翔实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下,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胜利的理论专著。也详细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周

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党外朋友、民族宗教界领袖，肝胆相照，合作共识，共谋国事的历史篇章。我感受到，通过亲自参加党的统战历史的编纂工作，让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终身受益。统战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无与伦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了全党的共识。统战工作是凝聚人心，汇集力量，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法宝。其工作是，联络感情，广交朋友，用政策和策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筑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当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资待遇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计物质得失，我看重的是所从事的工作。能把大学所学的理论，用到工作实践中，我感到无限欣慰。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清苦一些，但政治上、思想上的享受和收获，使我非常知足，退休了的我仍感受到这一生很有价值！我退休了，还将继续关心并热爱着我过去所从事的工作。

师恩难忘 情重如山

——感怀恩师赵宝煦

李桂霞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许多良师益友，给了我很多帮助，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赵宝煦老师。在我的记忆中，赵老师是严师更像一位慈父，引领我一步一步前行。

1970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74年毕业留校，分配到亚非研究所工作。当时赵宝煦老师是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兼亚非所所长。留校的第一天赵老师就找我谈话，谈话的内容现在我还记忆犹新。赵老师对我说：“桂霞你留在亚非所工作我们是做为双肩挑干部培养，希望你能成为一名业务过硬，领导能力强的骨干力量。”“在北大既要学会做学问又要学会做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做人要踏踏实实。”赵老师的话即使我感动又使我感到忐忑不安。我说：“我外语不好，基本功也不扎实，成为业务骨干很难”。赵老师马上鼓励我说：“你还年轻，在北大有条件学习和提高，我们打算送你和张连芳到西语系学习两年英语，这两年全脱产学习，学习结束后再工作。”领导的这一决定我连做梦也没想到。我当即表

态,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我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为了学好英语,我每天天一亮就到未名湖边朗读课文,背诵单词,寒暑假也不休息,甚至连谈恋爱也都放弃了。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英文有了明显提高。两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回所工作我被分配到西亚非州室,刚开始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时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翻译出来的句子不通,文笔也不流畅。我很着急,这时赵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马上指定梁英明老师为我的指导老师。帮助我修改译稿和论文。在梁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赵老师不仅关心我一个人,对所里其他几个年轻人的培养也特别重视。1976年,为了让我们迅速地提高业务水平,赵老师又为我们留校的同学精心安排了进修和深造,考虑到学以致用,他让我们直接上外系研究生的课程,帮我们选修了经济系的世界经济,中文系的写作,哲学系的形式逻辑等课程。并安排我们利用工作时间听课。

赵老师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当我们考试取得好成绩时他特别高兴。记得有一次我在所里碰见了赵老师,他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桂霞祝贺你!”我有点莫名其妙,心想祝贺我什么呢?这时他拿出了我们考试的成绩单,指着上面的成绩对我说:“你三门考试成绩全是优。”我凝视着老师满头银发,回想起老师的付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充满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赵老师学识渊博,堪称学界泰斗,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为人谦和,爱生如子,他不仅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1977年我们五位年轻人都到

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无论谁结婚赵老师都组织所里的同志为其备一份礼品，并亲自带领全所同志表示祝贺。1977年12月份我生小孩，在西城平安里婆婆家坐月子，没想到年过半百的赵老师在寒冬腊月，冒着风雪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到平安里来看我和新生儿。见到恩师，看到他冻红的脸，握着他冰冷的手，我一时说不出话来，顿时热泪夺眶而出。这一桩桩，一件件至今还历历在目。

1981年我离开了亚非所，调到北大社科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当时赵老师正在国外做访问学者，不方便征求他的意见，他回国后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约我到他家谈谈，我向他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听后说：“你离开亚非所有点惋惜，但根据你个人的发展可能更适合于管理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干吧，行行出状元。”1985年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又调我到院系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我在北大工作了36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从来没有消沉过，“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是激励我学习和工作的动力。1999年，北大成立外国语学院，我担任党委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外语学院有1200多名学生，而从事学生工作的专职人员只有团委书记和我两个人，在人手少，学生多，困难大的情况下，我们知难而上，顶住压力，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很快打开了局面。在我工作期间外国语学院连续十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学生工作先进学院。我本人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德育工作者称号。在北大首届校园百花奖“我爱我师”评选活动中我获得了“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我虽然离开亚非所多年，但一直与赵宝煦老师保持联系，

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带上一束鲜花看望赵老师,每当这时候他都会特别高兴,总要问问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有时还问到我们七零级同学的情况,他记忆力特别强,能说出我们级很多同学的名字。

赵老师桃李满天下,在他病危期间他怕大家见到他感到痛苦和悲伤,他婉拒探视,大家只能通过国关学院了解他的病情。我非常想见赵老师,我打电话求师母,通过师母转告,最后赵老师终于答应见我,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我和恩师的永诀。赵老师虽然离我们远去,他那儒雅的风度,治学严谨的态度,和蔼可亲的面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情系母校

刘淑萍

今年5月28日,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国际关系学院)70级同学返校的师生大聚会,浓浓的师生情、同学情深深打动了我,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我的思潮被拉回到了40年前的风雨岁月。

1970年6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在国际政治系学习;1974年1月,毕业后留在系总支办公室工作,任党总支委员兼团总支书记;1977年9月,离开母校,回平谷老家工作。

40余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我总觉得,在这40年中,我不论走到哪里,母校的身影始终都伴随着我,我时刻情系母校。

夯实专业基础·恩师的小灶

我们是北大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学校已经停课五年。老师和同学都很珍惜这次复课的机会,同学们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对知识充满了渴望,都立志多学知识,夯实专业根基,报效党和国家。老师们也多么渴望重登讲台,传播知识,为祖国培养有用之才。他们为了讲好每一堂课,总是白天和我们一起

活动,晚上备课到深夜,那声情并茂、深入浅出的讲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难答疑和个别辅导。最难忘的是张汉清老师给我开的小灶——一次眉批。

那是1972年深秋的一天晚上,张老师在39楼前和我说:“小刘,今晚7点钟你到共运组办公室,我们一起看看你的论文。”晚上7点钟,我准时来到办公室,张老师已在屋内等我。我一看论文摆在桌上,当时有点紧张,心想是不是我写的不好,要挨批评?张老师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你的论文整体写得不错,抓住了主要问题,今天咱们主要是找不足的地方,我们先从论文的题目谈起。”张老师说:“对于五千字的论文,这个题目有点大,不如抓住二、三个特点展开剖析,这样写会更深刻一些。”然后,一段一段地帮我修改,有的批改甚至到了每个字。张老师一边改一边告诉我为什么这样改,所以对于我来说,每改一处都是一次知识的获取,都是一次认识的升华。而且,张老师修改文章的技巧也使我大开眼界,在批改过程中用了十来种符号,但页面非常整齐清楚。这是我享受的一次最高级的眉批,一生也只有这一次。

论文修改完了,张老师又给我详细讲了写论文的基本要求。我习惯地拿起笔纸,老师边说,我边记,老师讲的是那样精深透彻,我也生怕落掉一个字。张老师说:“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我由衷地说了声:“谢谢您。”

回到宿舍,快熄灯了,大半夜我都没睡着,张老师那亲切的话语,那种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不断在我脑海中翻腾。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学好专业知识,用实际行动报答老师的教诲。

从那以后,我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更加认真刻苦了,上课认真听

讲,小组会上积极发言,平时一有时间就去图书室。利用近四年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打下了比较牢固的专业根基,这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1995年,我晋升为高级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的评审,由区组织部负责递交材料,报北京市高级职称领导小组审批。我区报上11名同志,都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处级干部。组织部副部长通知我预审结果,只有我一个人的材料全部合格,论文写得也好。部长还告诉我,预审的同志说,留下的这份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听了这话,我特别高兴。心想,我也彰显一次北大学子的过人之处。

我写的论文题目是《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看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我从哲学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进行了论述,对社会上流行的不正确舆论进行了剖析。

我为什么要写这一论题?因为我是一名忠实的党务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是我的本职,又受过北大正统教育,对社会上“有钱就是座上宾”的拜金主义,早就深恶痛绝。我要为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而呐喊,这也是学习政治理论专业根深蒂固的缘故吧。我要感谢国际政治系的老师对我的教育与培养。

立足高等学府·系领导的厚望

1974年1月毕业后,我留在系总支办公室工作。沈仁道老师任系总支副书记,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任领导,我感到很荣幸。因上学期间,沈老师经常给我们学生讲话,有哲理、简单明了、务实、风趣,哪怕是批评的语言,既到位又让人易于接受,同学们对沈老

师讲话都很信服。

学校举办的留校生学习班结束后,第一天到系里报到,沈老师接待了我。我说:“沈老师您给我提提要求吧。”沈老师说:“一起聊聊。”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沈老师对我的教导。沈老师说:“从今天开始,你的身份变了,不再是学生,是干部了,你要适应这个变化。”为了使能够立足北大,沈老师主要给我提出三方面的要求:“一是继续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二是不断提高管理、组织方面的能力;三是加强自身修养,特别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做人之本。”最后,沈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能留在北大是幸运的,北大具有优良的传统、优越的条件,起点高、进步快。一个人的进步也是无止境的,永远攀登,才能在北大站稳脚。你还年轻,学习机会还很多,边工作边学习吧。”

听了沈老师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番话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深情与厚爱,也体现了系领导对我们这批留校生的期望与重托。

沈老师胸怀开阔、知识渊博,品质高尚、作风严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工作精益求精,是我学习的楷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以沈老师为榜样努力工作。沈老师对我严格要求,还多次给我提供锻炼的机会,激励我不断进步。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

第一次:有幸登上北大讲台

1974年下半年,北大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为社会上的理论学习做贡献,举办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课程由文科系承担,其中一课分到国际政治系,授课内容是结合实际,讲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体会，一天，沈老师和我说：“经系里商量这节课由你来讲，怎么样？”我一愣神，沈老师接着说：“系里成立了一个小组，帮你准备，石永义老师任组长，还有谢庆奎等四位老师。”我心里明白，系领导为了提高我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是多么用心地为我提供锻炼的机会啊！我欣然接受了。

备课小组第一次开会，围绕着讲稿题目、内容框架、字数、授课时间等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一一敲定，要求我用一周时间写完初稿。一周后小组又讨论，老师们围绕论点、论据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又隔两天，小组第三次讨论，讲稿被全部通过。老师们鼓励我勇敢上阵。

一天上午，讲课的时间到了。一进教室，我见座位上坐满了人，足有二百多人吧。我站在讲台上，看了一下表，定定神，八点了，开讲。“各位领导，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我叫刘淑萍，是国际政治系70级学员，刚毕业。咱们共同学习吧，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接着就正式开讲，共讲四个大问题，时长2小时。当时我想讲稿内容是经老师把关的，观点明确，针对性强，有理有据，我心中还是有底的。至于讲课的技巧，我努力向老师学习，标题语速要慢，重点地方重复一遍，这样容易记录，并注重声音洪亮。讲课时，我不时地往下扫一眼，看大家什么眼神，愿不愿意听。我看了多次，看他们听得都很专注，在认真做笔记。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中间没人打断我，内容刚好全部讲完。我说：“各位领导，今天的课我讲完了，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话音刚落，掌声就响起来了，我没有想到能赢得这么长时间的掌声，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赞扬和肯定。我连声说：“谢谢，谢谢。”当时我顾不上高兴，只是心里默叨着：“没砸，没砸。”当我要走下讲台时，有几位领导走上

讲台看看我的讲稿,又看看我,由衷地说了声“谢谢”。这时,我有点纳闷,为什么给我这么长时间的掌声呀?我想,这是对我这个农村穿着打扮,带着土气的24岁姑娘,敢登这北大讲台,给予的认可和鼓励吧。

讲完课,在学校六院门口我遇见了校党委副书记王丽梅,见我就说,“小刘,你讲的不错呀!”当天系里也知道了我讲课的情况,系总支领导高作民老师说:“小刘,你在学习班讲的很好哇,给咱们系学员也讲讲。”当天晚上我又给学员们讲了一次,同样得到好评。

这次上讲台,在备课小组的精心指导下,圆满完成了学校交给我系的任务,也使我得到了一次锻炼、展示自己的宝贵机会,与此同时,老师的严谨学风,诲人不倦的精神又一次使我受到了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第二次:当了一个月的班主任

1975年夏季,74级学员在大兴分校学习,当时任班主任的石志夫老师因过度劳累,出现了睡眠障碍。沈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很着急,对我说:“你去接替石老师,做一段74级的班主任,让石老师好好休息一下。”我当即说:“好,我明天就去。”我想,这是系领导对老师的关心爱护,也是为提高我的管理和组织能力。而且,石老师曾是我们的授课老师,从内心讲,我非常愿意去。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大兴分校,学生们见我挺高兴,因为入学时我接待了他们,印象很深刻。但如何当好大学生的班主任呢,我得从头学起,就像大姐姐一样和他们相处,与他们心心相通。白天学生有课,我就自己学习;晚上我和他们谈心、聊天,关心他们的思

想和生活，特别是注重“言传身教，率先垂范”。

那时的大兴分校，一到夏季，大概有三分之一时间劳动，管理稻田、菜田，还要养猪。养猪是一个班分一个猪圈，有5、6头猪。有一天雨下得特别大，猪圈里灌进好多水，猪都在里面游泳了。雨停后，分校领导下令每个班都要把猪圈里的水掏光，解救猪。听到命令，我立即集合十几位同学拿着脸盆去淘水，我站在猪圈的围墙上向下一看，水有1米来深，站在墙头上怎么淘？我一句话没说，一下跳进猪圈。呀！我这个儿头，齐腰深的水。紧接着跳下去的是范志曾同学，后边还有三个男生跳下去。我们几个人使劲地一盆一盆往外淘，圈内猪屎、猪尿的混合脏水溅得我们满脸都是，裤子湿不用说，连上衣都浸透了。别的学生在圈外挖沟排水，干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水掏干净，猪得救了。第二天，在分校召开的大会上，我们班和我这个班主任都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我只当了一个月的班主任学生就放假了，时间虽短，不仅提升了我的工作能力，也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在2008年召开的国关院友代表大会上，74级也来了不少同学，他们多次邀我在学院的台阶上合影留念，我们去水立方、鸟巢参观那天，刘学琼、刘进、刘金湘她们把我拉过去，和74级同学合影，我们的小合影，还被2009年院友通讯做了封底。

学子归乡·母校的牵挂

1977年9月，因家庭原因我离开母校，回到家乡平谷工作。开始和平谷县农机管理局政工科任宣传干部、科长，1983年任副局长，1984年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86年，平调到物资管理局，负责党群、宣传、综合治理、行政后勤、局机关党支部等多项

工作。

我到物资管理局工作不久就赶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这项工作涉及到精简机关管理人员、企业职工分流、企业转制等一系列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复杂程度极高的问题。但我努力发扬北大精神,配合党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发挥自己的优势,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改革政策,多次举办干部学习班,耐心细致地做好被精简干部、下岗职工的思想工作,把话说到他们心坎上,帮他们解决眼前实际困难,更主要的是帮他们树立创业的信心。

企业转制之前,清理外欠款是一大难题。组织上分给我追要外欠款的任务。起早贪黑,饿肚子,吃闭门羹不用说,还得绞尽脑汁想办法、定计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我和同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追要外欠款几十笔,近百万元。因为我要账效率高,单位同志风趣地说:“刘书记成了要账专业户了。”

这些年,上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人品和工作能力是认可的。曾几次被评为出席区的优秀党员,多次被评为区先进工会主席,两次被评为出席区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北大精神的激励和母校培育的结果,是老师一直牵挂与关爱的结果。

记得1984年,沈仁道老师调到海淀区委工作,我寄信给沈老师,没想到沈老师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小刘,这是我来海淀区委接到的第一封信。信中给我讲了许多基层工作的经验、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对我来讲,这真是雪中送炭。

1993年,沈老师调到市政协任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后,几次到平谷调研、讲学,都要抽出时间约见我。第一次在平谷招待所见到

沈老师时,我很激动。沈老师依然那样精神,那样谦和。午饭后,沈老师亲切地询问了我工作、家庭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沈老师听了很满意,并一再嘱咐我,要努力工作,也要注意身体。有一次,沈老师到单位看望我时,说他对自己的学生都很牵挂,凡是去过的地方,能找到的学生,都要见上一面,上次去哈尔滨见到了赵大文。沈老师这样关爱学生,我很受感动,每次见面我都能从沈老师那里得到很多教益。

大约 1990 年 7 月的一天下午,李茂春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系里来了老师在东高村兵营进行课题研讨,老师都想见我。我沿路买了两箱桃,马上驱车赶到。李茂春老师已在门口等我,到了会议室一看,啊!这么多老师,潘国华老师、梁守德老师、鲁毅老师、黄宗良老师、宁骚老师、李茂春老师……十几位老师,我真是喜出望外,都是当年给我们讲过课,我非常熟悉的老师。老师们还是原来那样和蔼可亲,我简单地汇报了工作情况,老师们听后很高兴。

老师的每一次到来看望,都给我送来了温暖,送来了母校的关爱,送来了北大精神,对我都是极大的鼓励,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爱北大、爱国关学院,这里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石。不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对母校有着深深的眷恋。衷心祝福敬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祝国关学院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千里接病人 冰雪映真情

——记民建会员、大连海事局高级工程师张泽显^{*}

张泽显是大连海事局船舶管理处高级工程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船舶管理业务水平上他是让人翘起大拇指的人，在与同事相处方面，个性十足的张泽显也会时常表现出助人为乐的品德。而发生在2006年2月26日广州至大连护送120急救车危急病人的感人一幕令大连海事局的同事始终难以忘怀。

2005年11月7日，大连海事局船舶管理处副处长王峰的父亲随旅游团外出旅游，不料在珠海突发心肌梗塞。王峰于11月13日紧急赶往珠海。医院建议实施搭桥手术，但术后病人肺部造成反复感染。珠海医院建议王峰将父亲转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

2006年1月17日，病人转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病研究所进行治疗。经检查发现王峰的父亲肾和心脏的功能严重衰竭，肺部呼吸不畅，每天都得靠吸氧机吸氧。转眼四个多月过去了。王峰和母亲一直住在广州的宾馆，轮流护理父亲。王峰每天

^{*} 摘自《民建大连》会刊，2006年第二期。

行走在银行、医院、宾馆。下岗的姐姐已经开始卖房寄钱来。额外的花销不计其数，王峰的父亲三天做一次血滤，平均两天花掉一万元，28 万元治疗费单位只能报销一部分，王峰长期请假，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身处领导岗位的王峰既得照顾父亲，千里之外单位的事情又割舍不下。如果继续在异地治下去，王峰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父亲病情继续恶化的处境。此事被和王峰同在大连海事局船舶管理处工作的张泽显看在眼里，这位即将退休的老大哥替刚提拔上来的副处长王峰忧心如焚。张工建议王峰把老父亲接回大连治疗，这样就可以边上班边照顾父亲。

建议被采纳后，如何接送病人的难题又摆在面前。由于旅途需要吸氧，民航局是不允许带氧气瓶乘飞机的。铁路方面的答复也是否定。飞机、火车行不通，乘汽车路途长会过度颠簸，吸氧的病人承受不了。想来想去，只有给病人租 120 急救车，同行的人乘坐小面包车。从广州到大连，途径 5 个省，需要准备足够的氧气。因为有时会在半夜到达某个城市，所以需事先电话同五地的供氧站联系，确保氧气供给。张泽显把一切都安排好后，立马带人赶往广州接王峰一家回大连。2006 年 2 月 26 日晚 10 点，120 急救车和跟随的面包车开始在广州出发，此时广州下起了毛毛细雨。经过数小时的行驶，抵达湖南时，天空已飘起了鹅毛大雪。而京广高速公路已经封路。此时，南昌和长沙都已是漫天暴雪。整个公路晶莹剔透，宛如天然的滑雪场。两辆车只好改走 105 国道。

由于路况不好，车速一小时不到 10 公里。路面冰像镜子一样。两辆车几乎是一步一挪。一行 8 人，两医生，两护士，两司机轮流倒班。王峰在急救车上照顾父亲，张工在第二辆车上负责换氧气。车开到河南郑州时，四周一片浓雾，车灯打开，2 米内看不到

对面行驶过来车的车体。将近4个小时的浓雾严重影响车速。脚底是冰,前方是雾。张工只好把车窗摇下来,将头探在车外,以护栏板为目标指导司机驾驶的方向。等到早晨4点半,从一个山区路出来,浓雾才渐渐散去。此时,高速公路依然封路。120车的司机从路障的警示牌绕到高速公路上。突然间一个侧滑,120车在原地急转两圈。供氧车的车灯,尾灯也都撞坏了。

黑夜茫茫,借着雪光,在事发现场,往下一看,下面是断崖、山涧和峡谷。一路上遇到撞车、翻车事故不下几十起。险情种种,车只能在冰路上缓慢行驶,张工乘坐的小面包车追到120急救车时,氧气只能维持20分钟了。尽管前方险象重生,但还是不能停下。车开到石家庄时,路况好转。经塘沽、锦州,终于上了盘锦至大连的高速公路。2006年3月1日中午,两辆车终于抵达大连,这一天是农历二月二。正常路况和天气不用两天一夜,而张工他们却走了两天三夜。此刻,一脸疲态的张泽显望着王峰,长舒了一口气。

今天我的工作年龄寿终正寝

桑国生

我是 1947 年 7 月 22 日的生日。我们老家都说我与财神同一天出生。究竟是哪个财神,没考证过。我一生中也没有特别富裕过。也对,财神手里的钱,都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发给别人的,他随便花就会被撸了。其实 7 月 22 日是我按照民间过农历的风俗登记在各个报表中的。对照公历,要到 9 月 3 日延边自治州成立、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日那天的上午 7 时,才是我出生的日子。可是,人家人事部门是从来不过农历的,你第一次填报的时间就是他们按照公历对待的标准时间。因此,我在今天的零点,必须结束我的法定的工作生命。

我 1961 年小学肄业;1974 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2007 年退休。如果大学三年算工龄的话,我的工作年头是 38 年。多少年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2006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退休的,中、高级职称退休工资都是 100%,7 月 1 日以后退休的就是 90%了。也就是说,我还没烧香,佛爷已经掉腚了。因此没有赶上转折点,已经很不错了。

听俺娘说,我父亲和爷爷都在 50 岁以前离开了人世。我今天

已经满 60 岁还活得很结实。按照家族的习惯,我已经多赚了至少 10 年的寿命。眼下,除了视网膜中心发点炎以外,各方面尚未显现死亡的征兆。身材虽然臃肿,但不尿糖。因此今后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现在的工资也不低,多活一个月,就有 2000 元的经济价值,真的要在意些了。但是,60 岁以后的人死亡的几率要高些。要说是期盼的话,那应当是希望最幸福的死亡方式;我曾经见过一赶大车的老板,往车上一坐,喊了一声:“驾”,就豁然而亡;还有一个 30 岁男子,与人打扑克,抽出一张 2,扬手空中,口吐一个“调”字,“主”字尚未出口,也豁然过去。没有任何的恐惧与留恋,就陡然地毫无挂牵地离开,那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啊!不知道鄙人有此福否。

准老太太在几天前,就赋诗庆贺我的生日。虽然按照民俗早了点,但还是让我激动万分、感动万分。同时也产生了“生不逢时”的小小遗憾。我 1983 年开始担任副科级领导,到 2002 年被一刀切下来,在 19 年的领导生涯中,有 14 年处在主持工作的一把手地位。有权的时候不流行过生日,没有权了过生日又成为潮流。不然,我过他个农历和公历两个生日,那礼品就会像流水一样流进我的家门。唉!人生总有错过。错过未必是坏事;礼品大大的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当贫下中农的时候,农民就用比较粗俗的话告诉了我这个真理:“世界上没有四方的木头来堵你这个四方的屁眼儿”!是啊,人生在世应当是满足又不满足。

我已经度过的时间平淡无奇。没有上学的时候,斗殴、打架、当俘虏、指挥偷瓜;上学以后与老师捉迷藏、课堂玩别的、将使用过的菜票再拿回来用一次、将体罚我的老师撞个腓顿;在农村劳动的 7 年里除了赶车扶犁以外,什么样的农活都干过,还卖过半个月的

菜,并主张“贪污”了三毛钱买了十个冰棍;在木帮上干过伐根、打枝、造材、调卯子、归楞、抬木头,还参与赌博输了 1.7 元钱等;政治上入团、当文化革命委员、造反派、深挖阶级敌人小组副组长、大队革委会委员、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党小组长;上大学期间,在北京国棉三厂织布车间当过准工人 3 个月;在天津新港当过三个月的装卸工;毕业后先后从事记者、编辑、宣传、文化、成人教育等工作,1984 年还被延边预备役师正式任命为步兵团宣传股长。可以说,工、农、兵、学、商的行当全部都实践过。坏事丑事做了不少,好事善事多些,因此总体上算好人。回顾以往,我,满足!尤其是去年冬天,建了博客,结识了一大批未尝谋面的老乡和朋友,使我焕发了些青春的朝气。以后,或许那个不太识货的单位请我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肯定会给我点银子。所以,退休以后的生活我估计是会非常自由而充实的。

2008.10.30



诗 词

师生情谊铸心间

任大奎

四十六年一瞬间，
今朝同乐聚燕园，
回忆师生共学时，
点点滴滴涌心间。
马兰^①实践同吃住，
师生情谊凝心间。
北汽^②共学经典著，
至理名言非一般。
北邮^③一起学党史，
晓知我党创业艰，
此段人生岂能忘，
师生情谊铸心间。

① 北邮是北京邮票厂。

② 马兰是门头沟斋堂马兰村。

③ 北汽乃北京汽车厂。

师情话谊

——参加国关学院七零级学员返校座谈会有感

李如海

蚌砂^①情谊真，
时空难阻分。
寒暑四十载^②，
重逢倍觉亲。
不话鹏程路^③，
热忆杏坛春^④。
宇^⑤内群英会，
星灿^⑥共举樽。

写于2016年5月28日夜，改于丙申年端午节。

① 蚌砂：蚌壳和里面由砂粒形成的珍珠，比喻师生关系好。

② 四十载：四十多年。

③ 该句指七零级学员都是耄老了，不再谈谁的业绩大。

④ 杏坛春：“杏坛”，讲坛，指受教育；“春”，一年，指读北大期间。意涵七零级学员在燕园读书期间，掌握了科学知识，提高了做事能力与理解了做人的真谛等。

⑤ 宇：房屋，比喻宴会厅。

⑥ 星灿：星光灿烂。比喻众多师生。

安平乐慢·盼同学相聚

张学斌

夜已三更，独眠穗城，孤灯伴雨声。酒意已醒，思念群中，满目同窗影。四十余载，江山容颜改，不变同学情。虽白发谢顶，心态似孩童。

来日温旧情，未名湖畔，笑声伴书声。南北学友聚，酸甜苦辣诉衷情。虽退家中，天下事，牵动神经。数高朋，尽享此景，足以宽慰平生。

沁园春·老雁一群

张学斌

博雅塔下，二院楼边，老雁一群。看老巢尚在，如初旧景，四十余载，几经风云。回忆当年，风雨无阻，练就钢翅能破云。双睛锐，可识途中险，夜夜归林。

不信注定命运，敢雷电交加战鬼神。恨豺狼虎豹，血口如盆，鹰犬小丑，仗势欺人。虽逾花甲，勇气不减，阵阵暖流来自群。看明日，大地春常在，雁聚难分。

永遇乐·相拥喜忆

刘家林

相拥喜泣，园露泄襟，索回无限。叙说情怀，半点无尘。几回梦惊断。岁月留痕，鬓已如霜。四十三载见。心如初，情似春江，昔日燕园行遍。

三十九楼，博雅塔前，大教室相辩。今夕楼去，塔影未变，远归寻巢燕。风流未减，空手烟波，情绵绵浩叹。人未寝，尊酒不空，半醉无倦。

和琴心剑胆

刘家林

无 题^①

(一)

燕园堂上智初明，
未名湖畔享书声。
导师倾心海不倦，
学子拼却醉颜红^②。
半世浩气展虹霓，
骤雨冰雪永攀峰。
武陵溪边今朝游，
桃化园中喜老翁。

(二)

宫门如海舟停岸，
衣带宽松终无怨。

① 此三首和陈剑华夫妇。

② 指苦读书，一切均抛在外。

春光怎解时光逝，
无钩垂钓炼金眼。

(三)

燕园同窗只数载，
情怀再展八方来。
莫伤两鬓不再青，
江南塞外笑颜开。

2016 年 1 月 17 日

致“未名湖畔”

石立新

“未名湖畔”是一个大家庭，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叙寒问暖，谈古论今，无所不谈，海阔天空，情深意笃，温暖如家，精诚所至，伏策涂鸦。

问春何处有，
雾霭吐嫩芽。
初来风展柳，
乍到雨浣纱。
明清聚百鸟，
物候发春华。
碧霞遮不住，
谈笑有人家。

卜算子·只把情挽住

郭兴柱

癸巳庚戌日，未名湖畔晤。已是华发两鬓霜，追忆同窗路。
酹酒醉学友，珠泪点点枯。功名利禄皆云烟，只把情挽住。

干杯！我的兄弟姐妹

——写在同学相聚的时刻

刘元胜

重回母校
像游子扑进母亲的怀里。
这一刻等得太久太久，
我们又相聚在春天里。
岁月的流逝，
洗净了青春的容颜，
带不走曾经的希冀和有过的美丽。
多少回梦里相聚，
燕园的情结是一生的铭记，
垂柳拂起未名湖的涟漪，
临湖轩的竹林青翠欲滴……
忘不了四十多年前，
从四面八方走来的年轻人，
用充满青春的朝气，
唤醒校园的每一个黎明，

干杯！我的兄弟姐妹

渴望清泉流进贫瘠的土地。
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探索着人生的真谛……
我们骄傲曾是北大人，
经历过时代的洗礼，
一路征程，
一路风雨，
用一颗赤诚的心和共和国一同呼吸。
把欢乐写进春风，
痛苦深埋在心底。
哪怕化作铺路的石子，
站起来都是座座山脊。
如今都成为永恒的年轮，
镌刻在五四大道的杨树里……
走过千里万里，
青丝化成白发染鬓，
过往的烟云，
都是拥有的记忆。
举起手中的酒杯，
斟满酒，
仰天长啸，
干杯！我的姐妹兄弟，
明天风光更艳丽！

2016年5月

为“五·二八”同学聚会即席而作

琴心剑胆^{*}

同学聚一堂，
情谊绵绵长。
百名胜兄妹，
南北是同窗。
五二八之日，
杏坛沐春阳。
才踏未名路，
师恩似海洋。
三九勤教诲，
四载列门墙。
燕园话岁月，
风云谱新章。

^{*} 琴心剑胆：70级院友陈建华、张淑琴。

与同窗夜宿大连湾

王愿军

晚霞如烟，涛声渐远，无垠瀚海连天。
鸥飞入画如诗，听水观澜。
荡舟汪洋万里，将歇息，船泊丽湾。
且把酒，庆平安，与君畅饮若娴。
抖落一身风尘，神气爽，偷得惬意悠然。
举目凭眺，满城风情万千。
魅力浪漫之都，不枉然，如掷玉盘。
临别时，海逸轩酣醉忘还。

燕园情深

张景豹

燕园同窗不相忘，
半世学缘梦意长。
斑白两鬓难相认，
惊讶恍然久目张。
片刻交流情绽放，
欢声笑语喜洋洋。
人生经历蓦回首，
苦辣酸甜尽品尝。
脚踏征途谋大志，
身临逆境自坚强。
安康平谈常知乐，
遇困拼搏事业昌。
美丽燕园留靓影，
吟诗诵词溢书香。
酒杯共举频繁贺，
畅饮三巡诉衷肠。
依依不舍挥巾去，
莫等残阳再擎觞。

燕园随想

滕利贵

（一）

回首四十六年前，
恰似弹指一挥间。
明月窗前忆往事，
情真意切夜无眠。

（二）

百年校训座右铭，
民主包容刻心间。
耳濡目染明心志，
强筋铸魂敢当先。

（三）

昔辞燕北赴千山，
今忆万难只等闲。
造福桑梓千秋业，
不见楼兰誓不还。

(四)

满身征尘返校园，
虽然个个白发添。
老骥伏枥志千里，
铭记使命谈笑间。